

我们一起走过

上海社会科学院
应用经济研究所四十年

叶孝慎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一起走过 / 叶孝慎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520-2492-0

I. ①我… II. ①叶… III. ①改革开放—成就—上海
IV. ①D61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4670 号

我们一起走过

——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四十年

著 者: 叶孝慎

责任编辑: 应韶荃

封面设计: 张晶灵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万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3.5

插 页: 24

字 数: 363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2492-0/D · 510

定价: 1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以此书

献给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

献给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四十年

序 一

这是一本回忆反映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历史的书。40年弹指一挥间,应用经济研究所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她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应运而生,是我们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三大经济研究所之一,与经济研究所和世界经济研究所并称一所、二所、三所。原本叫部门经济研究所,按照现在的学科分类,改名为应用经济研究所。

应用经济研究所始终以“学以致用,经世致用”为原则导向,坚持面向实际、立足实践研究经济理论,服务国家改革开放,服务上海现代化建设。记得改革开放之初,上海是支撑全国改革开放的“后卫”,处于很困难的时期。当时部门经济研究所的同志积极参与上海工业大调查,在《解放日报》发表《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提出真知灼见,为上海发展建言献策。部门经济研究所当时有一大批专家学者,如徐之河、陈敏之先生,姚锡棠、厉无畏老师,都曾为上海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出过许多前瞻性开创性的决策咨询意见建议。建所以来,应用经济研究所培养了很多熟悉工业经济、商业经济、财政、会计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在应用经济理论和决策咨询研究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今天,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进入不惑之年,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应用经

2 我们一起走过

济学科建设,加强对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的决策咨询研究,努力出更多好成果。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勇于创新,潜心研究,应用经济研究所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

序 二

叶孝慎同志的这一部长篇纪实,我是认真读了的。全书30多万字,全面、生动、形象、有血有肉地真实再现我们应用经济研究所40年来艰辛而又辉煌的历程,既理性,又感性;既有学者严谨,又有作家情怀,真是不错。书名也好,朴实,妥帖。过往40年,我们应用经济研究所一路走来,一起走过40年,一起经历40年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起起伏伏,出了一些学术大家,如徐之河、姚锡棠、厉无畏,在国内学界众望所归,有口皆碑。但更加重要的是,在我看来,我们应用经济研究所,受那样一些大家影响,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大潮里面,不是旁观者,超然物外,站在边上空谈,指手划脚,评头评足;而是弄潮儿,敢想敢干,亲力亲为,真正置身其间,紧跟时代前进步伐,跟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开风气之先,立汗马功劳。对于这一点,尽管余生也晚,当时又不在应用经济研究所,而是在上海财经大学读研;但还是感同身受,有深切体会。因为我读的是工业经济专业,博导又是杨公朴教授。杨老师不仅是上海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系主任,而且以前就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跟应用经济研究所的许多前辈是同事、朋友,尤其跟孙老怀仁先生有亲密交往。所以,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许多事,应用经济研究所的许多事,也就时有耳闻。至于更多学术上、科研上的切磋、交流,那就互通有无,更加频繁。应用经济研究所的许多人,对我而言,也就既亲切又陌生。亲切的是,他们的一些学术成果,甚至是


一些代表作品,那些论文、专著里面的具体观点,我都熟悉不过,很是亲切。陌生的是,我跟他们这些人,活生生的人,又从未谋面、共事,少了正面交往。所以,一旦真来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来应用经济研究所工作,新来乍到,一面似曾相识,神交已久;一面又得加快角色转换,从高校教学转向智库钻研,从偏重学理转向更多的学以致用、经世致用,更好更直接地服务于决策咨询。

前几天,我去华东医院看望徐之河、姚锡棠、谢自奋先生,三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我们应用经济研究所的前任所长。他们都跟我说了学以致用、经世致用的重要,让我倍感肩负责任的重大。我想我们站在新的起跑线上,直面下一个40年乃至下下一个40年,我们可以做也应该做的最重要一点,那就是李强书记前些日子来上海社会科学院调研时所说的,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做好决策咨询,服务于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建设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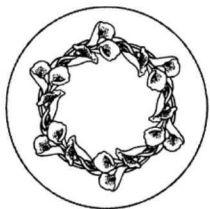
“行百里者半九十。”

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上下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干事业,我们这个有着光荣传统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跻身于第一批国家高端智库的试点单位,就一定能够在未来的发展中,凭借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独特的实践优势,通过学术研究与智库建设双轮驱动,作出更多骄人业绩。习近平总书记说,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习近平总书记还说,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总书记强调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与软实力之间的有机联系,我们就必须从增强国家软实

力的战略高度,搞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绝不纸上谈兵,向壁虚造,为理论而理论。我们就必须将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坚持到底,为解决现实问题尽到应尽责任。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王强' (Wang Qiang),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应用经济研究所所长



目 录

楔子	既往记忆太亲切	1
第一章	三分天下，实留部门经济研究所	13
第二章	背负因袭重担	31
第三章	六十而耳顺	49
第四章	不忘在“N”室的日子	60
第五章	谁在『放炮』	76
第六章	铁屋子	91
第七章	上海向何处去	102
第八章	我们没有时间了	120
第九章	掉脑袋的事	144
第十章	统计时代	169
第十一章	小三线	184
第十二章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200

第十三章	异军突起	220
第十四章	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227
第十五章	压舱石	237
第十六章	东进，东进	251
第十七章	产业：脊梁的考量	267
第十八章	转型：『上海2305』的奇迹	284
第十九章	长三角一盘棋	300
第二十章	『苏荷』中国化	322
第二十一章	永远的朝阳	340
第二十二章	走出东方	357
尾 声	学以致用，经世致用	365
后 记		368

楔子 既往记忆太亲切

这是千千万万个早晨中一个极其平常的早晨。2014年12号台风“娜基莉”正面突袭上海，伴有暴雨，气象台发布蓝色预警；于是，孙福庆拎包上班，多带上一把伞，一把铝合金骨架子的大号长柄直伞。

他习惯成自然，竟就忘了新任命业已下达，他从2014年7月31日起改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而上海社会科学院正放暑假，根本没人出勤。

孙福庆，1957年生，江苏邗江人。1975年复旦附中高中毕业。1976年参加工作，从吴淞口宝杨码头乘“沪航8号”双体客轮上岛，由南门港上到崇明岛。

崇明，中国第三大岛，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积岛，迄今已有1400年历史。

1400年的崇明史既是“海坍精光”史，亦是“辟草垦土，易而为田”史。因为崇明每年有500多公顷土地从江中长出，所以，1949年的崇明岛，总面积为606平方公里；2017年的崇明岛，总面积为1411平方公里；其间半个多世纪，足足长大一倍还多。

然而，精卫填海，猛志常在。崇明长大的另一面，则是原住民的垦殖和30多万上海知青的围填造田，人定胜天。

在孙福庆们以“沉重地修理地球”为“光荣而神圣的天职”^①的年代，农场简直就是崇明的代名词，农场职工简直就是知青化身。

在孙福庆们大批入职之前，长江南支的此岸和彼岸从来没有那样唇齿相依、血脉紧连过。

^① 任毅：《知青之歌》，《〈知青之歌〉的流传与冤案始末》，《名人传记》2013年第11期。

孙福庆们的纷至沓来致使北沿公路变成一条最多留有知青足迹的农场路。

北沿是崇明的“最美公路”，美就美在全线飘绿，路两旁齐整挺立参天大树，葳蕤树叶密密匝匝，遮天蔽日。

北沿公路与陈海公路基本平行，全长 70 余公里，东起东滩，途经前哨农场、前进农场、长江农场、东风农场、长征农场、红星农场、新海农场，最后抵达岛的最西端，跃进农场的江边上。

跃进农场原名新安沙，满地泥泞，丛生苇草，纵横河汉。

1960 年 9 月，中共上海市委批准成立上海市围垦领导小组和上海市围垦总指挥部。上海市围垦总指挥部下设新安沙、合隆沙、百万沙 3 个分指挥部。

同年 10 月，新安沙、合隆沙、百万沙围垦工程全面开工，至 1961 年 5 月竣工，历时 7 个月，3 万人参加围垦，修筑了全长 46.5 公里的江堤和 6 座拦洪坝，围得土地 11 万亩，相继成立黄浦区、吴淞区、高教局等 16 个畜牧场。《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给崇明围垦前线的一封信》，欢呼“三万围垦大军”“向‘海龙王’要土地，向芦滩、草滩要粮食、要鱼肉、要鸡鸭、要蔬菜”是“一个革命的创举”。《解放日报》头版报道《市区三万大军围垦崇明芦滩》亦称“崇明县北部和西北部的新安沙、合隆沙、百万沙等三片约十余万亩芦滩”的“引淡去咸”“变芦滩为熟地”是“巨大工程”。整个“工程的顺利进行”充分体现了“无比的英雄气概”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唯有这种气概，这种精神，才能确保“整片肥沃的土地从江海的怀抱中转移到英雄的上海人民手里”。

1963 年 10 月，上海市农垦局将两区（黄浦、吴淞）一局（高教）的畜牧场合并成新安沙农场，继续围垦新安沙的延伸部分，又得地 9 600 亩。

1966 年 10 月，“造反”盛行，改名成风，新安沙农场亦摇身变为跃进农场。

据统计，从 1968 年 8 月—1978 年 7 月，仅一个跃进农场，就安置了上海市区知青 20 310 名。孙福庆就是这两万多人中的一个，他当时在四连大田班务农。

大家都说插队落户苦。其实，要说劳动强度，我们要比插队落户苦得多了。因为一般农村，即使南方，至多也是一年两季，早稻，晚稻。我们崇明农场是三季，还要多种一季棉花。再加上插队落户记工分，比较散漫，相对自由，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我们不行。我们是农场职工，企业

化管理,定时出工,统一上下班。一刀切,拿工资。第一年每月18元,第二年每月24元;排长多3元,27元。“三抢”时,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司空见惯,绝对不能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真的很苦。(引自2018年2月26日,孙福庆口述实录)

大田里的活,苦到了孙福庆。但孙福庆生性倔强,从不叫苦。不仅不叫,反倒自得其乐,偏爱上了农业。以致1980年高考,他毫不犹豫,以优异成绩考上了上海交大农学院经济管理系。

1984年,孙福庆本科毕业,正赶上上海经济研究中心招人,想招一个能搞农业经济研究的年轻人,到交大农学院阅档。来人见孙福庆是中共党员,各科成绩不错,就要他了。

上海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于1980年12月26日,由董家邦任常务干事、召集人,陈敏之任常务干事、办公室主任。

1995年12月22日,根据市政府决定,上海经济研究中心更名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由王战任总干事、办公室主任。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是为市政府决策服务,承担全市决策咨询的研究、组织、协调、管理、服务的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机构。孙福庆在这一机构里一干30年,一直干到一纸调令,把他调到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当所长。

新官上任三把火,更何况孙福庆生性使然,凡事亲力亲为,不敷衍塞责、推诿拖沓。于是,人家放假,难得清闲、安逸;他反倒天大热,人大干,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从市府转岗,来到社会科学院,我开始有点犹豫。毕竟不再年轻。一动不如一静。不想再换地方。但组织部说了,调我到部门经济研究所,主要考虑三点。第一点,加强领导,加强部门经济研究所跟市里的联系。第二点,带出一支队伍,尤其是年轻、精干的研究团队。第三点,给你也留一点时间,整理一下多年来的学术成果。没想到,真的来到部门经济研究所,反而更忙。通过调研,摸情况,发觉部门经济研究所名声在外,有辉煌

过去,但进入 21 世纪,跟市里的重大决策脱节了,参与度不够。即使参与了,也是不深入、不了解,两张皮,信息不对称。还有队伍建设不可持续。老的退了,年轻的接不上。还有所名,也是要改。迫在眉睫,不能再拖。
(引自 2018 年 2 月 26 日,孙福庆口述实录)

长假后头一天上班,孙福庆正式在全所大会上跟大家见面,便就快人快语,直言三层意思。一是重振雄风,对接政府,坚持问题导向,更好地服务当下,服务实际。二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绝不得过且过,青黄不接。三是更名,恰如其分,名正言顺,鲜明突出两个“致用”,鲜明突出“学以致用,经世致用”。

关于正名,鲜明突出两个“致用”,鲜明突出“学以致用,经世致用”,孙福庆不仅在会上说了,也在会后找王战谈了。

王战跟孙福庆是老熟人,长期共事,多有合作。

1985 年 2 月 8 日,国务院批转《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其中说到“上海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应当迈出大的步子,走在全国的前面。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改革创新,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大胆进行探索,力求各项改革既快又好地展开”;孙福庆就跟王战合作写了上海郊区发展战略。当时的孙福庆是上海经济研究中心工农业研究室科员;当时的王战是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也搞农业,后转外贸。

1992 年,王战任上海市计委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所长兼上海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孙福庆是外经处主任科员。1995 年,上海经济研究中心翻牌,变成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王战扶正,任主任、党组书记;孙福庆是开放研究处副处长。1996 年 3—12 月,孙福庆去香港,在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发展研究部挂职锻炼。2000 年,调回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任开放研究处处长,2006 年为党组成员、副主任。王战则于 2007 年上调中共上海市委任副秘书长兼市委研究室主任。之后,便是孙福庆于 2010 年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纪检组组长,王战于 2012 年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

还有就是 1998 年 4 月,长江开发沪港促进会成立,王战是副理事长,孙福庆于 2006 年任秘书长,2008 年任副理事长。还有就是 2000 年 10 月,上海

WTO 事务咨询中心成立,王战是理事长,王新奎是总裁,孙福庆是总裁助理,并于 2006 年任副理事长。

王战调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比孙福庆早两年。

王战认真听完孙福庆的正名说,深以为然。

因为部门经济是舶来品。部门经济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全面引进苏联模式的产物,全面引进苏联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产物。当时,以苏为师,一切向老大哥看齐。在苏联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下,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相对分割,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的应用与各个部门的体制和运作方式密切相关。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传统的计划体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因此,过去计划经济的一些基础理论和政策实践已经不适应或难以满足时代的需要,部门经济学的名称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学科的性质和经济发展的现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学科的发展,更名为“应用经济学”。^①

应用经济学的研究方向由原“部门经济学”演变而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如是说。

李悦进而又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类。政治经济学是以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性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经济学;包括产业经济学在内的应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当然,众多的自然科学都是从不同角度来研究生产力发展规律的,但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任务,只能落在应用经济学的头上,或者说是落在生产力经济学的头上。”^②

李悦是中国人大教授、博士生导师,1932 年生,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天津宝坻人。

^①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第一部分,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简介·一级学科简介和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 页。

^② 李悦:《产业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 页。

李悦出过 10 余部专著或教材,发表过百多篇论文,自己认为“最主要的是是一篇文章,三本专著”。^①

李悦所说的“一篇文章”是指他与蒋映光(时任《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合写的《斯大林对雅罗申柯为生产而生产观点的批评》,首发在 1979 年 9 月 8 日《人民日报》编印的内刊《理论宣传动态》第 113 期。《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说李悦的《斯大林对雅罗申柯为生产而生产观点的批评》“吹响了真理的号角,受到了胡耀邦同志的重要批示,掀起了浩浩荡荡的全国性生产目的大讨论”。^②但《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则说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最初是 1978 年到 1979 年春天,从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角度提出来的”。^③

吴江亦言之凿凿,在其回忆录中明确说到有关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的发起缘于(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课程中学员们对于一个问题的争论——我们的经济工作是否存在着‘为生产而生产’的问题”。吴江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他在“听取汇报”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责成汇报者整理成一个材料送胡耀邦,并在材料上提出应就此撰写一篇评论文章”。

胡耀邦在材料上作了批示,支持第二种意见,这就是《理论动态》第 160 期刊载《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一文的由来。此文由“理论动态组”的吴振坤执笔撰写。^④

事实上,早在 1979 年 1 月 17 日,邓小平同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等人谈话,就已直言“过去工业是以钢为纲,钢的屁股太大,它一上就要挤掉别的项目,而且资金周转很慢。要先搞资金周转快的,如轻工业、手工业、补偿贸易、旅游业等,能多换取外汇,而且可以很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⑤

同年 3 月 23 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说到年度计划和国民

^{①②} 李成刚:《李悦:掀起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中国经济时报》2016 年 11 月 11 日。

^③ 《继续开展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十分必要——首都部分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座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人民日报》1980 年 11 月 7 日。

^④ 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吴江回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81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71 页。

经济调整是“大方针、大政策”时，又一次强调“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现在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钢的水平，也不光是由数量决定的，还要看质量、品种、规格。”^①

1979年1月18日—4月3日，中央在京开了两个多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诸多议题中就包括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②而邓小平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则可见他的3月30日讲话“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③

还有，1979年1月19日上午，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邀请北京的三十多个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的理论工作者，座谈‘计划与市场’问题”；“有的同志”在“会上发言”，就说，薄一波曾提出计划要以吃穿用为纲，后来受到批判。那么计划到底应以什么为纲？是以钢为纲，还是以吃穿用为纲？这是直接涉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重大问题，应该搞清楚。^④

还有，1979年4月15日，邓小平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血清之父”李政道及夫人，说到中国正在调整年度计划和国民经济，又说“这种调整不是要放慢发展速度，而是为了搞得快些。搞经济，有时就要退，不退就不能进，退一步进两步。例如，五届人大决定要搞六千万吨钢，现在考虑只搞四千五百万吨，着重在提高质量。要把力量移到见效快的工业上去，移到轻工业、能源等其他方面，见效快些。”^⑤

至于李悦所说的“三本专著”，那是指《中国工业部门结构》《产业经济研究》和研究生教学用书《产业经济学》（第2版）。

1983年版的《中国工业部门结构》，是国内第一本专论工业结构的著作，曾获朱镕基好评。而同于2004年4月面世的《产业经济研究》和研究生教学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97 页。

② 祝华新：《政治漩涡中的〈人民日报〉》，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11 年版，第 89 页。

③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65、167 页。

④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关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作用——关于“计划与市场”座谈会纪要》，《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资料——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文章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32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05 页。